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异化风险与治理

李雯博 熊小洋

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10.32629/jief.v7i12.20301

[摘要] 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引发了教育主体性式微的隐忧。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分析人工智能重塑教育关系的潜力与风险。研究发现,技术推动师生角色转型,形成人机共生的主体格局,但技术与资本的共谋亦催生数据囚笼、算法越位等异化形态。治理需以算法透明与主体复位为支点,在协同中校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

[关键词] 人工智能; 思想政治教育; 异化

中图分类号: TP18 **文献标识码:** A

The Alienation Risks and Govern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abl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nbo Li Xiaoyang Xiong

School of Marxism,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ot only enhances efficiency but also raises concerns about the decline of educational subjectivity. This paper, based on Marxist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criticism, analyzes the potential and risk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reshaping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 and student roles, forming a human-machine symbiotic subject structure. However, the collusion of technology and capital also gives rise to alienated forms such as data prisons and algorithm overreach. Governance should be based on algorithm transparency and subject reset, and in collaboration, calibrate the imbalance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lienation

前言

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已成为重要议题。对于思政课教学而言,推动人工智能与教学深度融合既是顺应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助推教学精准化、增强教学效能、提升教学针对性的自我需要^[1]。现有研究多聚焦精准教学与空间重构,效率提升显著,却未以马克思异化理论系统审视技术重塑主体的哲学风险。

1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技术、教育与人的辩证关系

人工智能介入思政教育,本质是技术参与人的思想塑造。人机共处之下,辨明其潜力与风险,需回到马克思,从技术、人与异化三重视角确立批判框架。

1.1 作为社会关系的技术嵌入

马克思主义技术观超越了“技术中性论”的浅层叙事,将技术置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核心位置。首先,技术是生产力的关键要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

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2]。推及当代,人工智能同样是延伸人类实践能力的强大杠杆,而教育正是这一杠杆作用的重要场域。其次,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强调,“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3]。人工智能在教育场域的应用绝非纯粹工具性的,它必然嵌入并重塑师生关系、教与学的关系,以及个体与知识体系的关系。

1.2 实践中的主体生成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是审视教育主体问题的哲学基石。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论断“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讨论的出发点:人的本质并非先验固定,而是在具体、历史的社会关系中被界定和塑造人的本质生成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思政教育即通过师生、生生及人与知识的互动,参与这一主体的历史建构。其次,主体生成于对象性实践。人通过对

象化的劳动确证自身本质力量^[4],在教育中体现为教与学的双向转化:教育者的目的与能力对象化为教学成果,受教育者将教育内容内化为思想品德结构。教育的根本目的,正是促进受教育者作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主体的生成。人工智能的介入,为这一双向转化过程增添了新的变量——它既可能成为延伸主体本质力量的新客体,也可能成为阻碍这一转化的异己力量。

1.3 审视技术风险的批判透镜

借助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可审视人工智能介入教育后潜藏的负面效应。异化即人的造物反转为支配自身的异己力量。在教育中,师生持续供给的数据与算法模型,可能蜕变为规训主体的数据囚笼,此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当教学与学习分别沦为对技术方案的执行与对算法推送的接驳,教育便丧失了自主创造的活力,发生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当教育在人工智能驱动下沦为纯粹的知识技能训练或数据绩效竞争,它便背离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使命,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最终,人与自身的对立必然导向人与人的对立,表现为师生情感的疏离、教育者对技术替代的焦虑,以及因算法偏见与数字鸿沟而加剧的教育不平等。

2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新格局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技术机制,深刻介入教育主体的生成与实践过程并在数字化重构过程中,主体、客体以及主客体关系发生了颠覆性转变^[5]。

2.1 教育者的主体重塑

人工智能的介入,使教育者得以从程式化的教务劳动中抽身。学情数据的实时分析、教学方案的初步生成以及学习过程的伴随式评价,均可交由技术系统完成。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并非替代者,而是以协作者的身份扩展教师的认知边界与行动可能——教师设定价值坐标与教学目标,算法据此推演多种实施路径,而最终的取舍、调适与意义赋予仍由教师完成^[6]。由此,教育者的工作重心发生位移:知识传递的职能部分让渡于技术,价值引导、情感激发与教学创造等更具人性深度的事务则得到凸显,教师的角色亦随之从单一的知识权威转向与智能系统共生的引导型主体。

2.2 受教育者的主体激活

传统教学中受教育者多处于被动接收状态。人工智能的介入正在改变这一格局,重新塑造了作为社会行为主体的人。借助虚拟现实等技术驱动的沉浸式情境,学生可以置身于历史现场或道德两难情境,在具身体验中增强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7]。作为智能助教的全程伴学,则使学生在持续的个性化互动中,从被动的“被灌输”者转变为主动的信息搜寻者、问题发现者与知识的自我建构者。

3 人工智能赋能进程中主体生成的异化风险

人工智能在为思想政治教育描绘美好图景的同时,其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的深度交织正在催生新的异化形式。

3.1 数据囚笼与人的片面发展

人工智能驱动的个性化学习系统,通过持续收集与分析学习行为数据,构建精细的个人知识图谱。然而,由于算法的研发环境具有封闭性,算法主体的价值指向和利益企图可以随意地植入设计过程,形成“黑箱社会”^[8],造成了思想视野的窄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主导的教育模式下,受教育者只能被动地接收那些经过算法筛选和推送的信息,容易掉入“惰性陷阱”,习惯于通过“低耗能”的方式获取碎片化的信息^[9],批判性思维在舒适的信息喂养中逐渐退化。此风险根植于资本驱动下数据提取的最大化逻辑,平台有内在动力通过喂养用户偏好以延长使用时间。算法由此成为一种高效的规训技术,它不再依赖可见的强制,而是通过个性化的关怀与满足,实现对学生认知结构的隐性塑造。

3.2 工具理性对教育实践的支配

当教育效果过度依赖出勤率、互动频次、测验分数等可量化指标时,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应注重价值引领,思想动态、价值认同等隐性维度,便面临边缘化风险。教育过程被简化为可计算、可优化的技术流程,情感体验的层次与人格成长的轨迹,都在数据曲线中被抹平。AI系统天然倾向于处理结构化数据,将复杂的育人过程还原为线性因果问题。由此导致教育评价体系的异化,原本作为教学改进手段的反馈调控阶段,逐渐异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10]。

教育者也面临从积极使用者退化为被动执行者的风险。过度依赖AI生成的统一教案,使教师临场发挥的空间被大幅压缩。对算法诊断的盲目信任,则进一步弱化基于长期观察才能形成的教育直觉。AI系统作为劳动资料,若从人主机辅沦为机主人辅,教学便从自由创造性的类本质活动异化为机械执行,教育者主体性由此消解。

3.3 “情感缺位”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背离

精神世界的研究具有高度个体化和复杂性,涉及思想内化、价值冲突与情感体验等多重作用,这些内在变化难以通过数据进行有效表征^[11]。人工智能无法复制师生之间一个充满理解的眼神、一次基于共同经历的无言默契。当思想政治教育中最为珍贵的生命对生命的影响被降格为程序对用户的响应时,教育便丧失了温暖人心的温度,背离了沟通心灵、启智润心的本质要求。人的发展是在真实的社会交往与情感互动中实现的,人工智能的交互在本质上是基于符号与程序的模拟,无法替代真实主体间充满不确定性的情感能量交换。将思想政治教育过度交付给人工智能,其结果必然是教育本质的异化:从丰满的、浸润式生命体验,降格为扁平的、功能性的符号互动。

3.4 “资本逻辑”的渗透与技术权力的垄断

掌握核心算法与数据平台的科技巨头,通过技术标准无形中塑造着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人工智能教育产品的高研发成本可能导致其率先在资源优越的地区普及,加剧数字鸿沟。更隐蔽的是,算法本身并非价值中立,其训练数据与模型设计可能内嵌研发者的价值偏好与意识形态倾向,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潜在侵蚀。在平台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下,教育数据不仅成为商业利润的来源,更成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当教育这一塑造社会主体的核心领域被资本逻辑深度渗透时,其公共性与自主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4 治理路径

基于前文对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新格局与异化风险的辩证分析,治理的核心在于扬其赋能之长。

4.1 价值引领与伦理规制

针对“算法至上”导致的教育价值迷失与“资本逻辑”的隐蔽渗透,价值引领构成治理体系的第一道防线。必须坚守技术为人服务的价值本位,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导向,响应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中“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数字伦理准则”^[12]。具体而言,应建立教育人工智能产品的前置伦理审查机制,由教育部门和学校组建联合小组,对拟引入技术项目的功能性与价值导向进行严格把关^[10]。同时,严格执行国家算法备案与安全评估制度,对核心教育算法进行定期审查,重点关注其是否存在固化“信息茧房”、加剧“数字鸿沟”的倾向。在人工智能教育产品的设计研发阶段,就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具体的技术规范和算法约束。

4.2 技术治理与算法可信

针对“数据囚笼”与“算法至上”的技术性根源,技术治理致力于以技术手段规制技术风险。在关乎学生思想品德评价、学业预警等关键应用上,应推行“算法可解释性”框架,要求算法能够提供其决策的逻辑与依据,让师生能够理解并审慎对待人工智能的输出。同时,构建教育大模型意识形态安全防护体系,在技术设计中囊括数据、算法及应用层面的意识形态审查机制,确保生成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保持一致。

4.3 主体赋能与素养提升

针对“技术依赖”导致的教育者主体性消解与“数据囚笼”对受教育者的认知束缚,主体赋能是治理的关键环节。应实施教育者数字素养全面提升计划,培训内容需超越工具使用层面,重点强化算法批判思维、数据解读能力及人机协同教学设计能力,巩固教师在“引导型共生主体”中的主导地位^[10]。教育者需主动重构对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认知,反思与数字化空间难以相融的传统因素^[7]。同时,将算法思维、信息辨识与数字伦理教育纳入思政课程体系,培养受教育者对信息茧房、算法偏见的

警惕性与批判能力,必须明确“人工智能辅助、教师主导”的基本原则。

4.4 制度构建与协同治理

面对资本逻辑渗透与技术权力垄断的系统性风险,必须构建多方协同的制度体系。应建立“政府—学界—企业—学校”四方协同机制:政府制定标准与监管,学界提供理论支撑与风险评估,企业承担技术合规与伦理设计责任,学校作为应用一线及时反馈实践问题。加快制定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在数据隐私、算法伦理、产品准入等方面的国家标准,为基层学校提供清晰指引。设立针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常态化风险监测和舆情预警机制,确保对突发问题能够快速响应。通过专项资金与资源共享平台,保障欠发达地区的人工智能教育基础设施投入,填补数字鸿沟,促进教育公平。

5 结语

人工智能进入思政课堂,带来的不只有便捷,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追问:技术究竟是帮我们把人育得更好,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把育人的标准交了出去。本文借助马克思的异化概念,重新打量了技术入场后的几处微妙变化。算法替学生筛选信息,也在替学生划定眼界;数据让评价变得精确,也让那些无法被数据捕捉的东西变得无足轻重;教学被程序优化得越来越顺畅,教师的临场判断却越来越找不到用武之地;人机交互愈发频繁,师生之间那种带着体温的触动却愈发稀薄。治理不是把技术推出去,而是把人的位置摆正。算法不能是看不见的黑箱,价值的底线不能交给机器去算,教师该拍板的地方不能让程序代劳。说人工智能是教具的一种,它该为人的成长服务,而非反过来要求教育迁就它的逻辑。

[参考文献]

- [1] 操菊华.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教学精准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图景[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04):141-147.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0,209.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0.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2-163,501.
- [5] 张百合.AI技术赋能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出场语境与实践路径[J].传媒,2024,(18):73-75.
- [6] 董雅华,赵成林.论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变革[J].思想教育研究,2025,(09):49-56.
- [7] 连晓龙.数字化转型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衍变与建构[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4(05):135-144.
- [8] 温旭.智能算法助推高校精准思政的逻辑进路[J].思想理论教育,2020,(06):81-85.

[9]史宏波,李晶晶.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空间向度[J].思想理论教育,2025,(10):56-63.

[10]倪松根,蒯胜平.数智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运行机理、内在张力与优化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17):67-70.

[11]余双好,邢宏波.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实证研究的空间与局限[J].思想理论教育,2025,(09):58-64.

[12]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25,(04):16-20.

作者简介:

李雯博(2001--),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农业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政教育、高等教育。

熊小洋(2001--),女,四川内江人,四川农业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政教育、在线教育。